



王志纲
战略思想库



行成于思

王志纲中国走势
思考录

王志纲 著

人民出版社



行成于思

王志纲中国走势
思考录

王志纲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王志纲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

(王志纲战略思想库 王志纲 主编)

ISBN 978 - 7 - 01 - 005994 - 5

I. 行… II. 王… III. ①经济史—中国—1986 ~ 1994—文集

②社会发展史—中国—1986 ~ 1994—文集 IV. ①F129. 7 - 53②K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753 号

书 名: 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

作 者: 王志纲

特 约 编 辑: 李 宁

责 任 编 辑: 刘一冰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5994 - 5

出 版 发 行: 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行成于思毁于随”。一个靠思想和智慧名世、立世的人，其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本书以作者曾为记者时，对中国命运、历史进程及不少尖锐社会问题的追问、揭示、探讨的代表性文章为经，以作者今天同编者关于过去与现在、主观与客观、台前与幕后的反思交谈为纬，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真面目，读来饶有趣味，发人深思。

王志纲^{wang zhigang}

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贵州生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曾在社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3年，曾任新华社记者10年。1994年10月从新华社下海，成为独立策划人并创办王志纲工作室。

他领导的王志纲工作室作为中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策划研究机构和民间商业思想库，一直处于行业的领跑地位。现在北京、上海、深圳设有常驻机构和专业咨询团队。自1994年创办以来已经积累了上百个成功案例，出版了10本专业著作。

王志纲现任广东私企商会首席顾问、浙商研究会学术顾问以及四川成都、安徽黄山、云南丽江、浙江绍兴、福建厦门、重庆等多个城市发展的战略顾问。

王志纲工作室网站：

<http://www.wzg.net.cn>

<http://blog.sina.com.cn/wzgoffice>

策 划：北京人民光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李 宁

责任编辑：刘一冰

电 话：010—82896621

蒋宏工作室 7

北京今秋至·盛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www.ertongbook.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总序

2006年岁末，当我结束了大三峡旅游战略的考察之旅，风尘仆仆甫抵京城的时候，这套《王志纲战略思想库》的初稿已放到我的案头，十本书，二十年。

这套文库，不仅从特殊的视角记载了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二十年风云史，也是我个人脱胎换骨，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知行合一、与时俱进的精神结晶；同时也是解读时代，研究转型之中的中国最鲜活的读本。

回首这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市场经济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人几千年宿命的同时，却又提出了巨大的时代悖论。当无数昨天还坚守着自己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们受时代的感召，义无反顾地扎进市场经济大潮中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生存问题，要生存首先要学会与“狼”共舞，既在市场中兑现知识、智慧的价值，而又不被“狼”群所同化。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既财智双赢而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

这套文库真实地记录了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在时代洗礼和市场历练中的苦苦追寻和长久探索。从下海的第一天起，我就试图探寻和破解知识分子的市场化生存之道，在几乎无时无刻不与市场的力量博弈、与商人过招、与政府官员对话之时，我始终在思考和求证着这个命题。

尽管当时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堂吉珂德式的自不量力，但我们坚持了，

而且走出来了。总结这二十年来极富传奇色彩的历程，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条路不仅有，而且有着广阔的空间。

这套文库正是从不同侧面完整地反映了我和我的团队作为一个中国本土战略策划机构的成长经历，生动展示出全球化竞争浪潮中东方智慧的运用之道。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于智力行业在认识上所经历的一次次洗礼，显现出中国顾问咨询业的发展脉络。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一直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自1996年以来的十年间，我们已有十几本著作出版，把每一阶段的收获和心得无偿地奉献给社会。也许正是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也许正是对于团队“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的独特定位，才使我们一不小心蹚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咨询新路，找到了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经得起实践考验的东方策划和东方哲学的奥妙与神韵。可喜的是，这种奥妙和神韵不但已被许多企业家所接受，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我们也得到了社会和市场的高度认可。无论是从冰天雪地的黑河到四季如夏的三亚，还是从巫山云雨的三峡到十里洋场的上海，都有热心的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拿出工作室的著作让我签名。最令我惊喜的还是，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地方经济的发展思路因此而得到提升。同时，无数的读者也强烈地渴望我们能尽早出版一套完整的文库，把我和工作室这二十年来的探索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当国内众多的出版社纷纷找上门来时，我选择了与国内最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合作。在北京的一次工作场合，人民出版社的黄书元社长曾当面向我表达了对这套文库的重视。我也不无调侃地回应道：一个既非政要，也非显贵的草根之人，竟也能获此殊荣，这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思想的力量在起作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库的出版作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要无愧于时代和读者的厚望。因此我们秉承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从过去的十几本著作中精心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七本，经过重新编辑再次奉献给读者，另加入最近撰写的三部新作，共合成十本，取功德圆满之意。我们的宗旨就是要使这套文库既尊重历史的原貌，又富有时代的气息。不但使读者能完整地看到王志纲从一个媒体人到一个策划人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与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而且还能全面了解

一个中国本土战略策划机构的理论探索、哲学思考和在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东方智慧。

《谋事在人》作为第一本浓缩我个人人生经历和策划实录的著作，1996年刚一问世就不胫而走，成为当年最火爆的畅销书之一，以至于我在美国看到只要有华文书店的地方就有《谋事在人》。甚至直到今天，我在各地做项目的时候，还能遇到好多人把珍藏已久的这本书拿出来请我签名。这次的再版除了是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外，我还要谨以此书献给作者谭启泰先生，以告慰他英年早逝的在天之灵。

谭启泰先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是当年在上海滩与余秋雨先生齐名的大才子。作为名噪一时的《南风窗》杂志的主要创办人，谭先生同我因约稿而相识，因切磋而相知，因相知而萌生了写作《谋事在人》一书的冲动和激情。后来的事实证明，《谋事在人》作为启泰先生生命的绝响，不愧为大师手笔。

《谋事在人》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写明星的任何一本畅销书。它的风行不仅将我推到了“中国策划家”的地位，更给中国的策划市场大大添了一把火。面对市场的巨大需求以及各地、各界大众的渴望和盛情邀请，终于有了我在1997年岁末的中国巡回演讲之行，随之也就有了《策划旋风》的诞生。

《策划旋风》全景式地记录了我在1997年岁末短短半月中在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几大城市进行的旋风般巡回演讲的实况。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对当时我所开创的对话式演讲风格进行了实录性的展示。演讲中最具特色、大胆且具轰动效应的部分是现场的有问必答。坚持真实性第一，《策划旋风》还是保持了原貌。这次再版又加入了最近一年来我在全国各地一些重大场合的演讲内容，使之更加富有时代气息，也更加具有启发意义。

树有根、水有源，人的所作所为是有渊源的。《行成于思》是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十年间所撰写的重大文章的一次结集。那十年，正赶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社会巨变，面临诸多新问题，迫使我去思考，而且是超强度的思考，从而强化了我的思维能力，为我日后从事头脑产业奠定了基础。各种文体的文章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主要的热点问题，透过这些文章，不仅可以重温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我

的思想轨迹和观察思维方式，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知易行难。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形而上时是巨人，在形而下时却是侏儒。工作室在广东华南板块之战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战例和反思结集于《大盘时代》一书，今天一并纳入文库推出。

这场后来被载入中国房地产教科书的经典大会战，不仅吹响了中国地产走向大盘时代的号角，其对中国房地产发展走势、乃至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出了广州、广东而波及全国。同时，也使沉闷多年的广州地产再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预示着中国地产开发从此走进了战略时代。

财智时代，是我对知识经济在中国的独特解读。通过阅读《财智时代》这本书，读者能在对昨天的回顾和对明天的展望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对财智时代的理解会更为深刻。

《城市中国》是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感悟和总结。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今天，当城市经营还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时尚话题的时候，长期潜行于市场经济深海之中的工作室，已经在这个几乎是包罗万象的领域奋力耕耘了5年的时间。《城市中国》就是工作室这5年来实践的一次毫无保留的总结和告白。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已走出体制外，但我却始终保持着相对超然和独立的立场。这种既不属于甲方也不同于乙方的立场和观点，使我具备了与“狼”共舞、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由此便产生了《丙方的观点》一书。

读者将会在《丙方的观点》中看到我对企业家、商帮、文人等诸多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的解剖与针砭、观察与思考。

《找魂》作为工作室的第一本战略性著作，融会了我们这个团队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历。但也绝不只是一部中国本土战略策划机构的创业史，更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国人，当我们在海纳百川的时候，千万不能丢了自己的本，不能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和文化丢在脑后，只有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只有对整个东方文化的神韵、哲学有相当的理解和体验，并辅之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难杂症。

三年前，工作室曾有幸参与了大成都城市战略的制定，后来的岁月中又介入了成都所属的十几个区县发展模式的探索，得以亲身参与并目睹了大成都如何破蛹化蝶的每一个细节。《城变》这一崭新的著作，就是对这个过程详尽而全景式的展现。它所和盘托出的，是中国一个传统城市在经历了惊世之变后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学意义。

图像可以到达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时空无法到达的地方。这套文库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推荐的观点，就是《财智论语》这本新作。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浓缩了我二十年来的思想精华。无论是格言妙语、轶闻趣事，还是地域解读、人生感悟，都短小精悍、喜闻乐见。它正如一碗由无数黄豆磨成的豆浆，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细细品来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二十年的积淀，终于迎来了这套文库的付梓。当我把这些思想成果结集成这十本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时，心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

很久以来，我就把工作室定位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所以我们更注重在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积累，常常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事业。因此，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做一个“自选动作”的创造者，当这个“自选动作”创造出来以后，就会把它毫无保留地传递给社会，去“唤起工农千百万”。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矛盾的选择，这不是犯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大忌了吗？我的解释是，这叫做“教会徒弟，饿瘪师傅”。只有肚子随时处于饥饿状态，才会去觅食，才会去努力，才会去奋斗。天道酬勤，因此我们常常有幸能沉淀下一些东西，能够不断地有精神产品和精神成果奉献给社会。

我一直强调“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我们之所以敢于去实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个梦想，也是基于对身处的这个时代感悟和认识。当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平静下来的时候，真正的价值还是体现在文化上，将会有大量的东西供后人消化和整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但喧嚣过后的三五十年内，我预感到，中国很可能真正出现一批巨匠和大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巨匠和大师呢？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批探索者，留下了很多素材、气氛和环境，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从这点讲，可能我们只是一批探

路者、一批过渡性的人，但我们充分燃烧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借这套文库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王志纲

二〇〇七年元月于北京

原版序言

编者（秦朔，《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现《第一财经日报》总编，以下简称编）：有幸担任这部文集的编辑，很高兴。

你这部文集定名为《行成于思》很有意思，与前一本介绍你的书《谋事在人》一样颇有些哲理。用这样一个书名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行成于思”出自唐代韩愈的《进学解》，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说，要想做成事必须善于思考。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做什么都比较成功，我认为原因恐怕与我爱想问题有关。

当记者十来年，正碰上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发生巨变，国家面临诸多新问题，这迫使我去思考，而且是超强度的思考，从而强化了我的思维能力，为我日后从事头脑产业奠定了基础。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我的思想轨迹，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编：通读了这部书稿，我觉得各种文体的文章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主要的热点问题。透过这些文章，不仅看到了“王志纲眼里的中国”，更看到王志纲式的观察思维方式。因此我想就有关这些文章的台前幕后以及你本人的思想历程提一些问题，我想这也许是读者想了解的。

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大家的印象中，你是一个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记者，曾驰骋南北、纵论天下。但自从写你策划生涯的书《谋事在人》风行中国以后，在许多人心目中，你现在只问家事，不问国事，只顾策划赚钱而很少写文章。那

么，为什么你在策划业已经一帆风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推掉很多业务，花不少时间和精力出这样一本书呢？

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谋事在人》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很大，除了正版发行的几十万以外，盗版书恐怕也有上百万，而每一位买这本书的读者又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别人。其中很多读者看了不止一遍，一些读者甚至能整段地背诵，并随时带在身上翻阅。更有些读者把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同时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不满足于一本粗线条的书，而是非常想了解我这十多年的思想轨迹，具体来说就是想读我过去写的书。可惜已出版的五本书我现在手里都没有了，很难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应读者之邀，出版一个作品集。

《谋事在人》这本书之所以那么畅销，首先得感谢谭启泰先生。如果没有他那传神的文字和洞烛入微的剖析，这样一本描写普通人经历的书，很难得到读者如此的欢迎。遗憾的是，启泰先生已不幸英年早逝。我前些年不少文章是经他编辑发表的，现在出版这部书，也是我对启泰先生无尽哀思的一种寄托吧！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个实践的过程，但作为知识分子，我更看重的是把一种精神财富奉献给社会。我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理。文章和书是最直接的精神产物，不可独享、独藏，而应变成大众共享的东西，才能对社会有所作用，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释放。现在既然社会大众需求甚殷，不妨趁此时，从我当记者十来年和这两年搞策划所形成的200万文字中，精选出自己不觉脸红的30万字，奉献给读者。

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从另外的角度，去评验、去分析、去探讨、去研究一个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和一个所谓的策划家经历的从偶然到必然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同时，穿越时空隧道，从另一种视野，了解我们中国人是如何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走过来的。

至于有关我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一门心思下海捞钱的说法，可能解释起来很麻烦，甚至会越描越黑。有时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因为从骨子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当记者的最好材料，当初对从事新闻工作有一个简单的追求，就是像西方的一些名记者那样，当专栏作家，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想来影响并推动历史。但走了一段后，好像走不通了。于是命运开

了一个大玩笑，让我在 40 岁的时候正式离开了新闻界，走上了一条所谓策划之路，另一种靠思想吃饭之路。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殊途同归”。策划这条路，相对于记者舞文弄墨而言，似乎是一条新路，其实都是靠思想攀登，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亦是说，在人生道路上，原来我是从南坡往上攀，现在改成攀北坡；原来走陆路，现在改为走水路。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追求目标始终没变。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强调自尊、自立、自强。君不见唐代“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成了千古佳话，被很多文化人借以表达自己的一种高大、自傲和鄙视一切的心态。但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李白是屡仕不中，后来，好不容易经别人举荐，被唐玄宗所欣赏，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玩物，是别人用来粉饰太平、装饰生活的，自己的抱负和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斗酒诗百篇”。“安史之乱”时，李白又投到永王李璘的幕下，心存幻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最后反而被流放夜郎，行至半路，突然皇帝新的赦令下来，遇赦还乡途中才大彻大悟，于是赋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解脱后的轻松心境，被这首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因而没有自主性，李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而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和尝试的机会。前面一条路走不通，总不能停下来自暴自弃。有没有第二条路呢？我认为有的，我要通过自身的实践为知识分子走出一条路来。在命运的推拥下，我走上了策划之路，新闻界把我的这种选择称为“第三条路”，即不走红道也不走黄道，是一条不亚于权力、金钱的第三条路。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

我把知识分子下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下浅海。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计划经济开始松动的时候，在计划经济边缘出现了一些裂痕，开始有水进来，比如说市场经济。这时候下海的多是一些本来就处于体制外的人，他们大多是无业人员、农民甚至劳改释放犯，也混杂了一些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由于生存所迫，也成为个体户，练摊做小生意，倒买倒卖。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讲吃苦他们比不上进城的农民，讲打架他们打不过劳改释放犯，有的搞得狼狈不堪，连自信

心都没有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时候商品的大潮已经涨到肚脐眼儿了，一些好冲动的知识分子跳入海中，由于水还是不够深，一个猛子扎下去头碰到海底，碰了几个包，啃了一嘴泥，鱼没捞到，只捞到了一些小虾，有些人呛了几口水就开始往岸上爬。

一直到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商品经济的大潮终于形成了一种撼天之势，党的“十四大”决定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不仅体制外的市场之海要蔓延，要越过一切，就连体制内也要由陆地变成海洋。所以一切工作必须转向，必须与市场经济主动对接，由陆上行车改为水中行船。这是一个大的客观环境和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应该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商海。但严格地说，我当时的目的是不明确的。在1992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虔诚的“无冕之王”，只知道埋头写稿，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下海。但这次因为种种原因我也一个猛子扎到海里，当时并不是为了成为亿万富翁，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松绑的机制，在宽松的机制里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个独立：独立制片人、独立策划人、独立撰稿人。原本是想，走出体制之后，可以更自由地写文章；但是后来发现，光舞文弄墨、咬文嚼字养活不了家小，家里有一对双胞胎，要吃饭。怎么办？就必须当策划人，通过策划挣点钱来维持生存。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剩余的精力和兴趣，那就再搞搞电视。没想到两三年走下来，被命运所推拥，不知不觉地做了专业策划人，而且坐到了策划公司老板这个位子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上，处于巨大转变期的中国，呼唤这样一种产业的诞生，但传统体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社科院、研究所和大学里经济学家的东西，企业接受不了，这种情况就好像是“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没有这种产业怎么办？只能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寻找具有这种亮点、有号召力、有说服力的人。命运之神发现了一个王志纲。

除此之外，还有地利、人和。广东由于转型比较快，对市场经济提出的许多问题最有发言权。长期生活在广东这块中国市场经济的热土上，作为一个在前线冲杀的记者不可避免地要扮演和客串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而我在无意中发现和开发了自己的这种特异功能，加上自己不甘

寂寞的性格及比较丰富的阅历和活跃的、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许多成功的案例，通过这些成功的策划更确立了自信。我深信，从事策划不仅能养活家小，还能闯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可我没想到，当我一站出来，就被市场往前推，既然你挂出牌子来，市场就向你集中，忙不过来就逼得你把个人行为变为团体行为、企业行为，从个人追求变为群体的追求，从而使你产生一种使命感，由此创建一种策划产业。

可能有人认为我是捞钱去了。我觉得“捞钱”是没有什么罪恶可言的，但对于我来说它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是公司才能获取经济效益，才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转，保证事业向前进。但又不能完全是公司，纯粹的公司就要唯利是图，什么赚钱干什么，如果是这样我就不用搞策划了，也许做生意、搞房地产更赚钱；公司必须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但这又违背了我的使命感；同时我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个人的兴趣爱好。所以我讲，我这一辈子发不了大财，但又不缺钱花。一心发财我就走偏了；不缺钱花，是因为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当时有些人认为我离开新华社这块牌子就会完蛋了，没想到我居然用两年时间就迅速站立起来，而且树起了自己的品牌。于是有些人问我是否出来时就做好了准备，我说恰恰错了，我在宏观上、大趋势上充满自信，但在微观上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我只是想，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会被淹死，都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没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救了；知识分子没救了，中国也就没救了；中国都没救了，我王志纲被淹死还有什么关系。基于这种反推理，我才义无反顾，而不是缩头缩尾。

总之，今日出书，是出于一种交代，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交代，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交代。因为，作为一个骨子里仍是文化人的人，出书，永远是一件非常崇高而又神圣的事！

编：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市场经济的问题提得比较早，旗帜比较鲜明，较早地总结出“广东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你对这一问题很敏感，反复拿这个做文章。写出的一些东西回头看仍很对头。你怎么会有这种预见呢？

王：在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曾这样写道：“历史，常常是在悲剧和喜剧交替出现中前进的。中国这个最早发明了货殖（即经商）的国度，竟因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而长期陷于贫困落后。经过一位走过长征路、又谙于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老人指点，市场经济大张旗鼓地搞了起来。”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方针时，在这位老人的心中也许已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迟早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整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一步的广东人，已率先体验到了隆隆滚来的商涛市潮以及那令人手足无措的、撼天动地的啸声和冲击力，同时，享受到了提早赶海的收获和喜悦。出于一个记者的敏感，我开始捕捉、记录人们当时的活动和心态。同时，也得益于我的经济理论和知识，当我把纷繁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时，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市场经济的无穷威力。因此，在这一段时间，我的报道和文章一直以这个观点为主线，并在当时推出了一本对话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这不仅要有预见，更要有一种勇气。

如同我前边已说过的，我这个人，做人行文不喜奉迎。有道是，无私才能无畏，无畏则用不着奉迎。不奉迎者若又能有一套较为科学的观察问题的方法，那他离真理的距离就会近得多。要说我有什么经验之谈，我想就是这个，说白了，老话一句：做事先做人。

编：在你探索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广东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你很常用的一个参照系，当谈论外部世界时，广东往往成为你参照的一个坐标。你不断地走出广东又走入广东，在这里留下了你读者生涯中最多的笔墨。现在你的事业已遍及全国，你已走出广东，回眸昨天，广东对你有何意义？广东在中国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是什么？

王：如果我是一艘船，广东就是我经常停泊的一个码头。正因为如此，我这艘船可以轻易地离它而去，又可以很容易地靠泊它。因为它是一个码头，所以我对广东没有归属感，只有登陆感、靠岸感。我与广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有时候是很难谈清楚的，但是我感激命运的安排。由于在主观上我总想搏击风口浪尖，有所作为，这个风口浪尖，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常有人问我，如果你不到广东，命运会不会改写？我说命运可能不同，但成就绝不会低于来广东，在内蒙古也可能照样干出一番事业来。当时我曾排列一系列的任务，其中要写一本